

关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 若干思考

雷 云

提要: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用十分丰富翔实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广阔空间。本文就是以这些材料为事实依据,以1981年历史决议、2011年出版的党史二卷和习近平201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讲话为立论依据,经过梳理、概括,对晚年毛泽东形成这样的认识:他是一个理论上继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有着严重失误和错误、并且未能首尾相应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既不能全盘肯定甚至予以神明化,更不能全盘否定甚至予以妖魔化。在当今新历史条件下,能否客观、全面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晚年毛泽东,仍然关乎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关键词:《毛泽东年谱》 晚年毛泽东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作者雷云,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兼主席、研究员。(杭州 310025)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5.02.001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促进了党内外思想认识的统一。但三十多年来,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决议》的科学性心存疑惑,甚至出现两种极端倾向:对于毛泽东,一是全盘肯定,把他神明化,一是全盘否定,把他妖魔化;对于毛泽东思想,一是借口“高举旗帜”而继续奉行“两个凡是”,一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而主张弃之不用。因此,能否客观地深入研究毛泽东,不仅是对一位党的领袖人物能否科学评价的问题,而且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关系能否辩证认识的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国家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问题。

深入研究毛泽东,不能凭朴素阶级感情,也不能凭主观偏见成见,只能凭第一手客观材料,用事实说话。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于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六卷本,正是这样的事实材料。该书的“出版说明”写道:这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二十七年间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年谱如实地……既记述了毛泽东正确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理论、决策及所取得的成就,也记述了他的失误和严重错误及其所带来的损害和教训。”并指出:“这部年谱的编写,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采用客观记述方法,编

写者不作评论。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①惟其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索和研究空间。

本文的事实依据,就是《年谱》记载的十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试图从梳理和概括中还原一个真实的晚年毛泽东;立论依据,则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和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及习近平同志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讲话中所说的:“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②

本文的侧重点,是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别是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同时因限于篇幅,只是涉及主要的方面,并且仅是初读《年谱》后形成的初步认识。

一、一个理论上继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些同志认为,毛泽东在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理论上乏善可陈,唯有错误,更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这是偏见。针对这种偏见,邓小平同志指出:“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③我们在《年谱》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好文章、好思想,以下列举的仅是荦荦大者。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其一,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战略方针和指导思想。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他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这可以看作是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战略方针。1956年3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我党的对策,毛泽东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⑤同年4月4日,他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会议上又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指出“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而之。”并回顾两年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⑦1959年2月14日在会见智利客人时,还提出“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的论断^⑧。毛泽东关于“独立思考”、“探索自己的具体道路”、“自己的建设路线”的观点和“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总的指导思想。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思想理论渊源即在于此。

其二,构建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后来广泛征求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② 见201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④⑤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9、550、557页。

⑦⑧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0—311、591页。

意见,几经修改,于6月19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公开发表。这部著作的核心观点,一是肯定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由此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①。这是整个讲话的立论依据。二是首次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指出“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解决。三是首次提出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矛盾的学说,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作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例如“民族资产阶级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③。四是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④。这就必然得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结论。上述几方面观点有机统一,构成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从长远看,实际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它是探索“第二次结合”的理论奠基之作,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贡献。

其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利用价值规律。这一理论观点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特别是11月10日的讲话,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的教训,批评“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他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⑤同日,在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时加写:“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的作用。”^⑥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又强调指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⑦他还提出过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

其四,阐发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和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巨性。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同时,指出:“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⑧又说:“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⑨后来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⑩;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⑪。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更是反复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3、83、81—81、82—84、504—505、507、623、499、505页。

⑩⑪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4、270页。

性。他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出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需要经历一个很长过程。“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①这些论述，再联系《正处》中的分析，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社会主义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成这三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

以上这些理论观点，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第二次结合”的宝贵成果，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重要贡献，都应列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或者说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丰富和发展，并且成为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二）关于党的自身建设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党的根本宗旨、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作过系统深刻的论述，构成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在社会主义时期，又作了许多重要发挥。1957年3月18日他在山东省级机关干部会议上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②同年7月8日他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共中央好比是一个加工厂，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它拿这些原料还要制作得好，制作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来源出于群众。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③1958年5月20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④1963年9月9日在会见外宾时说：“我向马克思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向敌人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⑤1964年11月24日会见外宾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脱离了群众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了。”^⑥1971年8月27日，他针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炮制“天才论”，向工作人员讲解《国际歌》歌词，并说：“这首歌，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⑦1974年2月22日会见外宾时又强调：“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⑧

毛泽东非常憎恶党员干部搞官僚主义，搞特权，搞腐败。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性讲话中，振聋发聩地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⑨1959年12月17日在读苏联那本《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⑩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新制度的抗争看作是一种必然现象，真是非凡的预见和洞察力！

毛泽东高度关注党执政后要防止党员干部发生和平演变的问题。1959年11月12日他与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谈话，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引用杜勒斯所说的“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⑪1964年1月5日，他会见日共领导人时针对苏联正在发生和平演变的教训，指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

①⑤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9、261、437页。

②③④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7、189、356、34页。

⑦⑧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93、521页。

⑩⑪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7—268、237页。

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①同年11月中旬,广东省委给中央和中南局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中说:“现在看来,基层组织已经被篡夺和已经和平演变过去的,也就是说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更普遍的是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毛泽东批示:“很值得一读或两读。”^②正是基于对和平演变的警惕,他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6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③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一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思想;他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只是在实践中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居然把林彪、王洪文先后选定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这些思想和理论,核心问题是他一再强调的要使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永恒性历史课题,在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存在“四种危险”的新形势下,尤其警示意义和当代价值。

(三)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论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是一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对中国革命一切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首先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予以思考、诠释和解决。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依然保持并发挥了这一特点和优点。

毛泽东大力号召掌握辩证法,不要搞形而上学。他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④他批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任何事情都有两重属性。我们有些同志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⑤“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⑥

毛泽东运用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了一系列对立面的统一。比如:“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⑧“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⑨“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⑩另外,他还讲过好事与坏事、懂得与不懂得、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急与缓、苦战与休整、有“边”与无“边”等等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总结论是:“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⑪

毛泽东关于怎样看待错误的许多论述,也充满了辩证法。首先,他肯定任何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⑫“切不要相信什么一贯正确,人

①②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2、436、363页。

④⑤⑥⑦⑧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1、77、104、251、252、252—253页。

⑨⑪⑫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9、362、178页。

总是要犯错误,又正确又不正确。”^①其次,他认为对错误要一分为二。“错误有两重性。我们党也犯过许多错误,这教育了党,也教育了人民”,“错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损害了党,另一方面也教育了党;它损害了人民,也教育了人民。”^②“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③

毛泽东还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辩证法,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④;“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⑤他强调要有大局观念,指出:“顾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你那个地方越顾大局越有出路。现在的大局就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并用古典文艺作品中的故事做比方:“你看那位红娘,晚上那么冷,站在外头,后头拷红、挨打,她有什么利益?专门帮人家。还有白蛇传里的小青,专打抱不平。搞基本建设,轻重缓急要排队,要顾全大局。”^⑥

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谛和要义讲透讲活了。从一般原理和原则来说,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科学思想方法。

笔者认为,以上三大方面,是邓小平所说的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的“好文章、好思想”的集中体现。一些同志把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说得一无是处,是不公道的。事实上,他在思想理论方面仍有不少闪光点、真知灼见、独到见解和重要建树,是一个继续作出重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理论贡献是我们党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仍应成为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

二、一个理论上有着严重失误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我们从《年谱》可以看到,转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有过重大失误,特别是在他晚年,有着严重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决议正确分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⑦,从而确定了党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根本政治路线。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本人也明确地说:“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⑧但时隔半年,他在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却声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⑨他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就这样轻易地把八大的论断推翻了,实质也就是把八大制定的正确政治路线改变了。尽管此后他也曾多次讲过要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左”倾观点,像一条主线贯穿于他步入晚年的全部思想理论之中。

《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22年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⑩显然,《宣言》和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八大

①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8、550页。

②④⑤⑥⑧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35、417、557、119—120、223页。

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9页。

⑩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3页。

的政治路线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而毛泽东的观点则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其直接后果是使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推迟了整整二十年。

(二)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既然判定社会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那就自然把抓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了。离发表《正处》讲话强调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不到半年,就发动一场全国范围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并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宣布: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①。运动中把五十五万多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领导人、各界著名人物、专家学者甚至在读大学生和中小学教职工,以及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打成“右派分子”,划入剥削阶级范畴,列为专政对象,在混淆两类矛盾、践踏民主法制、制造冤假错案等方面,开了恶劣的先例。接着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抓住彭德怀的一封信发动“反右倾”斗争,反击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并从理论上作出概括和定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还表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②这无异于警告:以后大凡像彭德怀那样敢于向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的,都属于阶级斗争,而且又是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会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把三百几十万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斗争扩大化由此延伸到党内。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再一次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提出“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③。从此,他的思想和精力就集中放在阶级斗争上。1963年2月,他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提出社教运动中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1965年10月8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④。1967年11月3日,“两报一刊”送审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修改稿,文章首次系统概括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核心是肯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毛泽东批示:“修改得好,可用。”^⑤后来这一理论还转换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1971年8月25日,听到华国锋汇报农村多种经营、粮食征购等问题时,毛泽东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⑥这里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是同义语,指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刘、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同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从外地回京的专列上同李德生、吴德等人谈话时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⑦1975年11月,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搞全面整顿,抓经济工作,实质是毛远新所说的“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再次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⑧他还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⑨同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当戴维说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发展时,毛泽东说:“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③④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2、533页。

⑤⑥⑦⑧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7、392、404、621页。

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49页。

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①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第一,人民内部也有阶级斗争,譬如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能把阶级斗争同敌我斗争混为一谈;劳动人民中间也有阶级矛盾,譬如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能把阶级矛盾等同于阶级斗争;即使阶级斗争也并非都是你死我活,不能动辄定性为“生死斗争”。第二,党内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属于思想是非范畴,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有些问题即令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也不等于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第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还有阶级斗争,但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应当满脑子是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而不能满脑子是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搞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目”。第四,“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更是说不通。难道人口多就要斗吗?按此逻辑,人口增加到十多亿就更更要斗,人口越多越要斗,这么一来,国无宁日,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永无保证。第五,“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个观点是站不住的。阶级斗争学说虽是马克思的学说的一个极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也不是它的灵魂和理论基础,把作为博大精深科学体系的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怕的曲解。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他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一再犯错的根子所在。其后果就是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普遍化、无限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严重颠倒敌我,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建设。

(三)关于修正主义的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也以苏为戒,开始关注修正主义的问题。在1957年6月19日公开发表的《正处》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指出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②。这一论断中已含有要着重反对修正主义之意。到了60年代,他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从修正主义中找阶级斗争的根源,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到反修上。1964年3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了。”^③1965年10月10日,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④1966年4月,多次审阅《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⑤这一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同年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通称“五一六通知”,是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在修正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画上等号,而这是不正确的。按照列宁的观点,有“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也有“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⑥,所以不能只反右的修正主义,不反“左”的修正主义。第二,对形势作了唯心主义的估量,认为修正主义已在中国泛滥成灾,特别是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③④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4、534、577—579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页。

断定中央已出了修正主义,必须造反,也就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第三,武断地宣布修正主义的性质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反修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第四,“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主要指的是刘少奇,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并没有对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作出准确解释和严格界定,在界限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任意使用“修正主义”概念,动辄扣上“修正主义”帽子,发动所谓反修防修、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违背了他自己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原则和自己过去曾提出过或支持过的理论观点、路线方针,造成“毛泽东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悲剧,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一场空前浩劫和巨大灾难。

此外,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失误,还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症结和解决途径的问题上。1957年他在《正处》中把基本矛盾概括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集中起来是指生产关系还不完善,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体制中存在着种种弊端却被忽略了。结果是:一方面,使认识一直停留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抽象概念上,没有把它们尤其是“又相矛盾”的东西深化和具体化,从而一直未能把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另一方面,老是在改变和提升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希图建立单一的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关系,而当这种想法和做法在实践中受挫时,则又从阶级斗争中找原因、谋出路,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①。这是在所有制上急于求纯、急于过渡,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规律,从而“生产力起来暴动”^②的一个理论上的原因。

二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上。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在读苏联那本《教科书》时提出,要以基本矛盾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他进而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虽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但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③应当说,这些论述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第一,过分强调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易于导致对这两者关系在认识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事实上,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在较长时间内使之保持平衡和稳定,才能为它发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在它刚刚建立就急于加以改变、拔高,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即是明证。第二,提出上述所谓“一般规律”,似乎忽视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后的两种背景和条件的根本区别,实践上就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又搞夺权式的政治大革命,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即是明证。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是在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范围内发生的。毛泽东热衷于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去推动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论。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早在“大跃进”年代就不止一次提出要破除工资等级制之类的“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谈话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存在教条式的误解,想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取消这种法权。

三是在怎样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毛泽东其实并不是完全忽视发展生产力,只是凭良好主观愿望和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生产力,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他在1958年3月9日的成都会议上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20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5页。

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

说：“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问题，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采取‘冒进’。”^①这甚至成为他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一个指导方针。早在1957年7月，他就提出“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②。一年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提出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1月28日他说“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③，到同年6月22日即改口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④与此同时，赶上美国的时间，也提前了二十年。为此号召全党全民搞几个“大办”，特别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要求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内就完成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以及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使社会生产力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主要因饥荒而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量增加。这就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七分人祸”，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

三、一个理论上未能首尾相应和贯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年谱》中还可以看到这样两种情形：一是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起先提出过非常正确的观点，但后来又不加论证而提出相反的观点，前后矛盾，自相否定。二是他对一些重大错误能够反思教训，但又不能深入彻底和修正错误，理论同实践脱节，以至一错到底。

（一）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往往自己否定自己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下面仅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怎样看资本主义。1953年毛泽东曾说过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也让小生产绝种。后来他纠正了这一说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1956年12月7日，他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在京领导人座谈时表示：“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⑤但不到两年，他在1958年8月称赞人民公社时却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更是怂恿“四人帮”一伙鼓吹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

关于怎样看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9月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意共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⑦这话讲得何等深刻和到位！但在1975年11月“批邓”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⑧

关于怎样看路线斗争。1960年3月毛泽东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

①②③④⑤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9、193、290、373、47、425页。

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1页。

⑧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0页。

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①但到了1971年9月,却说“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②。这显然已把搞社会主义的方法和看法不同的路线问题,改变为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把作为第二种、第三种矛盾,改变为第一种矛盾即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于是把政治斗争的重点确定为整“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全国掀起到处揪斗“走资派”的狂潮。

关于怎样看修正主义。1963年6月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泛用“修正主义”概念,把充其量仅是思想上有点右的东西都看成修正主义,甚至把许多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他原先赞成和支持过的东西,也说成修正主义,造成在党内外“修正主义”标签到处贴,“修正主义”帽子满天飞的局面,并且在“修正主义”与“反革命”之间画等号,把“反修”作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开展阶级斗争的第一要务。

关于怎样看个人崇拜。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④,对个人崇拜持否定态度。1958年3月他改口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⑤这显然含有肯定个人崇拜和警告不要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之意。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在谈到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时,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⑥1970年12月18日再次会见斯诺,毛泽东又说:“说我是个人崇拜。……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谈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他说:那个时候的各种权,各个地方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⑦。但事实上,1968年9月经过“全面夺取”后相继成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给毛泽东发“致敬”电,电文中对他的颂扬,调门一个高过一个,“最”字越用越多,其肉麻之程度可谓无以复加,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可是毛泽东对这种极不正常现象沉默不语,听之任之。

(二)能够从理论上反思教训却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

毛泽东长于洞察,善于思辨,及时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但往往又沉吟不决,思想反复,不能勇于认识错误和彻底纠错。

比如关于“反右派”斗争。他在1962年4月反思说:“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⑧可是他不肯承认“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还怕“右派翻案”,在1957年9月22日,就提出了“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的问题^⑨。惟其如此,他不批准中央统战部于1962年7月提出的关于错划右派应予“甄别、平反”的报告,^⑩并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继续搞“言者还是有罪”。

又如关于“反右倾”斗争。他在1961年3月说:“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⑪他在1965年9月23日同彭德怀谈话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⑫可是又不敢宣布那次“反右倾”是个重大错误,没有勇气承认真理确实在彭德怀那边,更

①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3—364、564页。

②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4、358页。

③⑥⑧⑫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1、465、97、530页。

④⑤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3、311—312、209页。

⑩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06页。

不肯为彭德怀平反。关于反“左”反右,此前他曾多次有过正确的论述,尤其是1960年12月27日,表示赞同江苏一个报告中的提法:“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是个新提法,就这样办。”^①但他不肯承认过去的反倾向斗争违反了原则,往后还是一个劲儿地反右,甚至“文化大革命”中还把林彪那种“左”得不能再“左”的极左路线,说成其实质是极右。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力主批极左思潮,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②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改变批林整风的重点,继续批右,到1975年底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迅速推向全国,1976年4月又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革命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还毫无根据地把它同邓小平联系起来,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再如关于“文化大革命”。1971年9月13日,他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叛逃出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对毛泽东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刺激和打击,实际上他已对这场“大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开始发生怀疑。但在1973年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却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把刘少奇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③这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事实是,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酿成“刘少奇集团”的大冤案,也不会形成林彪这个反党集团。1975年11月3日他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但同时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④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文过饰非。“两个错误”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既有“两个错误”,何来“七分成绩”?岂止是“有所不足”?所有这些,都深刻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既有所反思、又担心被完全否定而没有勇气彻底承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可以说,林彪事件后到他逝世为止的五年岁月,他就是在这一内心矛盾斗争的痛苦中度过的。

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再到“文化大革命”,逻辑使然、一脉相传,贯穿其始终的是一种“左”的指导思想,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尽管它们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是洞若观火,有目共睹,毛泽东本人也在反思,但由于这些都是在他心目中关系自己功绩和威望的不可触动的底线,所以还是要假借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宁可违背共产党人的原则和党性,绝不允许否定和翻案。

四、结 语

总起来说,晚年毛泽东是一个异常神奇和复杂的领袖人物。在思想理论上,既有很宝贵的东西,也有非科学的东西;既有真理,也有谬误;既有思维严谨缜密的一面,也有主观随意性特强的一面。这两者同时存在,还互相交织在一起。前者使他仍不失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使他成为一个犯有严重错误而又往往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前者使他继续为人民创造福祉,后者使他给国家带来灾难。从总趋向看,愈近暮年后者的因素也愈益显现而成为主流。

晚年毛泽东之所以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缘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真诚信仰,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贞不贰,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懈探索,以及具有非凡的理论素养、超人的思辨能力、无畏的政治胆魄。这就使他成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7页。

^{②③④}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8、479、620—621页。

晚年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和严重错误,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而未能“成于毛”。其发生失误和错误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因素,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早已作出全面、正确、深刻的剖析。笔者这里想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能够反思教训却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是与他思想、作风方面的缺憾分不开的。比如他对许多问题道理上讲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实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言行不一。列宁说过: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用这一经典名言来比照,毛泽东显然做得很不够了。又比如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不能体察他们的所思所想。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亿农民渴望搞包产到户以恢复生产、免受饥饿,但他坚决认为这是刮“单干风”,不可容忍。1968年,广大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乱象已深感厌恶,怨声载道,希望尽快收场,但他仍强调这场“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必须进行到底,林彪事件后他又说这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他“远贤臣,亲小人”,怀疑与自己共同战斗几十年的一大批忠诚耿直的老战友对最高权力有觊觎之意、不轨之心而予以整饬,信用身边那些善于阿谀奉承和投机钻营的有野心、搞阴谋的人。他发动这场“大革命”就算是为了“反修防修”,但做这样的惊天大事居然绕开党中央而鼓励和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进行秘密策划,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也不符合他自己一再强调的“三要三不要”中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再比如他随着自己的权威被大树特树到巅峰,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以主宰一切的最高领导者自居,什么事都要由他说了算,在垂暮之年百疾缠身之际,还要独揽大权。他在党内搞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如邓小平所说的“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①,唯我独“马”,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以我划线,顺我者即为马克思主义,逆我者即为修正主义。总之,革命战争年代经他概括、其后他又一贯倡导的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自己率先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创造历史,但不否定个人特别是关键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起的就是这种决定性作用,而这中间就不能完全排除他个人思想政治品质因素的作用。

晚年毛泽东正确的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弥足珍贵,今天我们仍需继承和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至于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如能认真予以总结,也可引为深刻教训而足资我们鉴戒。对于这些错误,要在首先敢于承认其严重性的前提下作具体分析,分清几个界限,比如:理论本身的性质与实践中的偏离的界限;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界限;探索中可以避免的失误与不可避免的失误的界限;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林彪、“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言行的界限;发生错误的个人责任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的界限;毛泽东个人品质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端的界限;“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等等。在分清这一系列界限基础上,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必须有坚决纠正的勇气。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有错误就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伟大就对他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允许提出并纠正其错误。讳言错误、掩盖错误,甚至美化错误、维护错误,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笔者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正是这样做了的。《决议》深刻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②今天我们仍坚定地按这一精神去做,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高举改革开放鲜明旗帜,只会有利而无弊,有益而无害。

责任编辑:徐吉军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8页。